

编者按 3月9日,山东省第三十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表彰会在济南召开,特等奖获得者、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丁延峰,第十七届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奖获得者、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教授、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人才团队带头人王传领等获奖代表出席会议并接受表彰。本届评选中,聊城社科界共获得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7项,另有1人荣获学科新秀奖,获奖总量位居全省各市前列。这一结果彰显了聊城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深厚的学术积淀与综合实力,标志着全市社会科学界在打造新时代“聊城学派”征程上迈上一个大台阶。借此机会,记者对丁延峰和王传领两位专家进行了专访。

# 一位学者的「海源阁」之旅

访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丁延峰

■ 本报记者 朱海波

记者:丁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事海源阁研究已经十多年,成果斐然。很多人都很好奇,您当初是怎么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这个兴趣点是如何找到的?

丁延峰: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其实很重要。有人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会很痛苦。怎么找到呢?我的体会是,要多读书,像“过筛子”一样,最后那些筛不下去、让你心心念念的东西,往往就是你的兴趣所在。

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兴趣点很早就埋下了。我读大学时就特别喜欢藏书,买了很多书,有一次书被偷了,那种痛苦的感觉我现在都还记得。读完博士回来,我带了12箱书,读完博士后回来,变成了24箱。这种对书籍的由衷喜爱,直接决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当我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海源阁——这个中国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又坐落在我工作的聊城,自然就成了我无法回避、也最想去探索的“兴趣点”。

记者:确定了兴趣点之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您遇到过困难吗?

丁延峰:一旦确定了研究方向,就不能轻易改变。做学问就像打井,你需要专注地在一个地方深挖,才能挖出甘甜的井水。如果今天打一口,明天觉得别处好又换地方,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现代社会诱惑太多,很容易让人分心,这就需要你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为了专注,我也做了一些取舍。当时我有很多可以写论文的想法,比如研究傅斯年等。但如果我把精力分散出去,就会影响研究海源阁这个主要问题。所以,我把单篇论文和毕业论文结合起来做,集中解决一个问题的几个侧面,而不是解决几个并行的、不相关的问题。抓主要矛盾,该放弃的就要放弃。为了研究,2007年我放弃去上海等地发展的机会,回到聊城;2009年,为了能接触到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原本,我又去国家图书馆做博士后。这一路走来,靠的就是这份专注和持续的勤奋。

记者:您刚才提到要去国家图书馆看原本,这点对我们触动很深。能否请您谈谈,在研究过程中,您是如何对待第一手材料的?

丁延峰:我的信条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研究历史,特别是文献研究,基础就是对原始材料的占有和考辨。其中的甘苦,我自己体会很深。某馆藏的宋刻本《韦苏州集》,一册就要100元;为了省钱去国图查资料,我和同事一起住过国图旁边的地下室,20元一晚。还有一次,我查了一个星期的资料,做完的笔记却丢了,那种痛苦真是无法形容,只能重新再来。为了能看到那些珍贵的原本,我去过很多地方。这些辛苦是实实在在的,但因为有兴趣支撑,感觉也还能承受。

记者:在海源阁研究上,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王献唐、王绍曾等先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您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创新点的?

丁延峰: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前人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我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对这些,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动手,而是要理清思路:哪些问题解决了?解决到什么程度?哪些还没有解决?我总结成了“治学三说”。

第一是“接着说”。比如,前人都说海源阁藏书的特色是“四经四史”,那这“四经四史”的版本和学术价值到底有多高?是不是还有其他特色?我就可以接着这个话题往深处挖。

第二是“反了说”。比如,传统观点认为清代北方刻书远不如南方。但我通过详细考证杨氏的刻书情况,发现虽然他们刻的数量只有四十多种,但质量极高,很多是精品。这就纠正了之前的一些偏见。

第三是“第一个说”。也就是解决前人忽略的问题。比如,前人研究藏家,大多只关注他们怎么“收书”,很少有人关注他们怎么“用书”。杨氏为什么要藏这些书?是为了研究经学、礼学,还是经世致用?他们抄了多少书?刻了多少书?这些书对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什么价值?这些书对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什么价值?

些藏书的利用问题,前人几乎没怎么涉及。

记者:由“收书”到“用书”,这个视角的转换非常有意思。这似乎构成了您研究的一个核心框架?

丁延峰:是的。通过梳理,我发现过去的藏书研究大多是“就事论事”,只谈藏书本身,没把它看成一个系统。但实际上,从搜集到整理编目,再到刻书、抄书和学术利用,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藏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学术。像古代的大学问家戴震、段玉裁,他们本身也都是大藏书家。如果只研究藏书的皮毛,不研究它的内核——也就是它的学术价值,那这个研究就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尝试搭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收集保藏、整理研究、学术利用。把这几者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衡量一位藏书家的贡献,才能揭示出他们保存典籍、传承文化的实际价值。比如,我的《海源阁善本书录》就是试图结合“皮相”和“内容”,既看版本的外观,又研究文字的优劣,把它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都揭示出来。这在方法上得益于我的博士后导师陈力先生的指点。

记者:听说您近年来又拓展了新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汲古阁和宋刻本领域做了大量工作?

丁延峰:是的,海源阁研究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但不是终点。这些年来,我逐步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其他古籍版本学领域。

2025年,我和周广善副教授校笺的《汲古阁毛氏书跋校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汲古阁是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毛晋的藏书楼,毛氏藏书数万卷,刻书六百余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本书共收录毛氏书跋400余篇,其中新辑110余篇。我们依据前人成果及现存汲古阁藏书、刻书、抄书文献,重新搜辑相关书跋,力求全面呈现毛氏书跋面貌。所辑书跋均源自原刊书籍,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并对书跋中相关词句进行校勘、注释,加条语揭示版本信息、相关史实。这本书是2023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成果,也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汲古阁藏书、刻书、抄书研究”的附属成果。接下来会有多部汲古阁研究专著出版。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宋刻本。2020年,我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存世宋刻本叙录”。这个项目旨在对全球现存宋刻本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整理与研究。据调研,海内外已知存世宋刻本约3500部。目前,已经完成300多万字的文字叙录部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宋元本研究》已经出版,《存世宋刻本研究论集》即将出版,《存世宋刻本图录》亦在编辑之中。同时,我们从其中遴选出400余部代表性样本,编成《宋版集萃》,分批次开展系统性影印出版。第一辑共收录38部宋刻本,其中27部为孤本,已于2025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些珍贵的文物价值不可估量,罗振玉曾跋孤帙宋槧《南华真经》说“所见宋槧诸书,此为第一矣”。2025年,我还在《光明日报》刊发了题为《赓续文脉:存世宋刻本的再造与利用》的文章,探讨宋刻本的整理、保护与利用问题。

记者:从您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最后,能否给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朋友们一些建议?

丁延峰:我想用一句名言和大家共勉:“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如果时间不值钱,生命也不值钱了。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把大把时间花在手机上、酒桌上,觉得非常可惜。第一,要努力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哪怕暂时找不到,也要尝试着去热爱你现在的工作。第二,要勤奋专注,用好每天的“净时间”,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干工作,都要有“代表作”的意识,要能拿出显示你功力的精品,不能只满足于应付差事的“普品”。第三,要保持学习的心态,有名师指点是幸运的,更重要的是要把那些让你“豁然开朗”的点子,真正接受下来,并付诸实施。

做研究也好,干工作也好,说到底,都是一场自我修行。希望我们都能在各自的领域里,沉下心,扎下根,做出实实在在的东东西来。

# 深耕学术守初心 薪火相传育新人

——访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奖获得者、聊城大学教授王传领

■ 本报记者 朱海波

记者: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奖这份荣誉是对您学术工作的高度认可。请问您获奖的最大感受是什么?这份荣誉对您后续的学术研究有何激励?

王传领:首先感谢评审委员会的认可,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学校社科研究工作的认可。得知获奖时,我既意外又欣慰,意外于能从全省优秀同行中脱颖而出,欣慰于多年的学术坚守有了回报。学术研究无捷径,唯有脚踏实地方能有所收获,从求学至入职聊大,我始终以勤学上进为信念深耕学术,这份奖项于我而言,既是责任也是新起点。后续我会继续聚焦新媒体文艺领域的前沿问题,以更严谨的治学态度攻坚克难,带领团队深化校际合作与跨学科研究,力求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为区域社科研究发展贡献力量。同时,我也会把这份激励充分融入日常教学中,将自己的学术探索心得和科研经验传递给学弟学妹,以更饱满的热情践行立德树人的使命,在课堂上做好勤学上进的榜样,用心指导每一位学生,引导他们勇攀学术高峰,努力在科研与教学的双赛道上稳步前行,不辜负这份荣誉与大家的期待,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学者的责任与使命。

记者:您长期深耕新媒体文艺研究领域,这一领域兼具热点与难点。请问您当初为何选择该研究方向?又如何立足本土形成自身研究优势?

王传领:选择这一方向,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个人学术兴趣的延伸。新媒体技术深刻改变了文艺创作、传播与消费模式,新形态文艺作品不断涌现,蕴藏着大量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博士阶段我跟随谭哲教授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逐步深入该领域,也努力为新媒介时代大众文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在研究中,我始终坚持“立足本土、聚焦前沿、突出特色”,一方面扎根本土,结合现实探索新媒体语境下地方文化的传播与创新路径,让研究更具实践价值;另一方面紧跟学科前沿与技术发展,聚焦领域难点问题,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研究成果与教学、社会服务相融合,让学术走出书斋,主持的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均围绕领域前沿,力求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的双重价值。

记者:入职聊城大学以来您的科研成果丰硕,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请问这些科研成果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在学界和社会层面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传领:回顾这九年的科研历程,我认为这些成果的核心价值在于立足中国文艺发展的前沿实践,致力于构建一套具有阐释力和前瞻性的理论话语体系。从学界影响来看,这些研究有幸获得了同行的关注与认可,多篇论文被高频引用和转载,相关观点被学界同行参考借鉴,推动了新媒体文艺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同时,我依靠三支青年创新团队开展研究,吸纳省内外高校青年学者,促成了校际合作与跨学科研究,培养了一批新媒体文艺研究的青年力量,为该领域的学术传承注入了新活力。

在社会层面,新媒体文艺与大众文化、数字生活紧密相连,我的研究也关注其社会文化影响,通过解读新媒体文艺的创作与传播规律,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文化传播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融入课堂教学与研究生培养中,让青年学子理解数字时代的文艺发展,助力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文艺研究与创作人才,也让新媒体文艺的研究成果走出学术殿堂,实现了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服务聊城发展与促进大众繁荣的结合。



王传领,中共党员,文学博士,聊城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创新团队、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人才团队、聊城大学光岳青年学者创新团队负责人,入选聊城市“美林学者培育工程”、聊城大学“光岳英才”(第一层次);指导的多名学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并多次荣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省级和国家级学科竞赛奖励三十余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5项,出版学术专著2部,发表CSSCI来源期刊论文20余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聊城市社会科学先进个人、聊城大学教书育人楷模、聊城大学首批“党员先锋”等多项荣誉。

记者:您作为多个青年科研团队负责人,不仅自身学术成果突出,还带动了大批青年教师成长,在人才培养上也成绩斐然。请问您在团队建设和学术传承方面有哪些理念和做法?

王传领: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薪火相传的接力赛,团队建设秉持凝心聚力、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理念。我们的团队以聊大青年教师为主体,吸纳省内其他高校青年学者,聚焦新媒体文艺、文艺美学等领域,通过校际合作、跨学科研究实现优势互补。团队建设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搭建交流平台,组织学术研讨、课题申报等活动,拓宽成员学术视野;二是以身作则,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带动团队成员坚守学术初心;三是因材施教,结合成员研究方向与特长制订个性化成长计划,在课题、论文写作上给予针对性指导。

在人才培养上,我坚持教学相长,用心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作为硕士生导师,我始终手把手指导学生,他们的每一篇论文我都从头到尾逐字修改,所以才有了连续三年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并获得国家奖学金这样的成绩。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在高校工作,有的进入党政岗位,有的成为中学教师,看着学生从懵懂到独当一面,这让我感受到人才培养才是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我也始终注重引导学生树立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学术后备人才。未来,团队将继续聚焦学术前沿,加强跨学科与校际合作,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同时持续发挥传帮带作用,为聊城社科事业和学校学科建设添砖加瓦。



丁延峰,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聊城大学文学院院长、运河学研究院教授。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史记》研究会理事等。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编《论语文献集成》《中国大运河年鉴》等。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等10余项。在《文学遗产》等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古籍文献丛考》《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宋元本研究》等10余部。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奖,山东省社科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5次,其中《海源阁藏书研究》《汲古阁藏书、刻书、抄书与校书研究》入选2011年度、202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分获2012年山东省社科重大成果奖、2025年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特等奖。